

集雨窖文丛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编



集雨窖文丛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20周年纪念文集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文集/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10

ISBN 7-301-04714-2

I. 集… II. 中… III. 经济思想史-中国-文集 IV. F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445 号

书 名: 集雨窖文丛——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成立 20 周年纪念文集

著作责任者: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

责任编辑: 梁鸿飞

标准书号: ISBN 7-301-04714-2/F·371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3121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排版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82614608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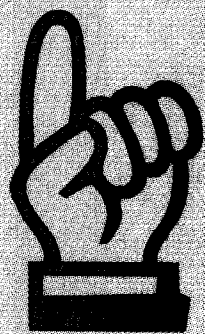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43.5 印张 700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88.00 元

第一部分

学科建设



毛泽东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 在历史分析中的运用^{*}

胡寄窗

封建社会是我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辉煌的文化成就和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基本上均出现在这一历史时期。(照一些主张秦汉、东汉或魏晋封建制的古代史分期论者的看法,则战国的文化繁荣应属于奴隶制时代,即使如此,后代的科技发明仍是惊人的。)兼以二千多年来社会经济的持续成长,又保存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文物,这就使我们对祖国封建时代的研究,既有意义又有可能,实为世界上任何别的国家所望尘莫及。我自己是从事经济科学的理论工作者,拟仅从封建经济方面提出一些看法。经济关系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基础,就这方面稍事探索,也许对封建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不无用处。

要研究我国封建时代的经济问题,有两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必须首先明确。一个是自春秋后期以来随着土地自由买卖之流行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有别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另一个是不像西欧中世纪较长期停留在自然经济状况下的那样,中国封建经济一开始就伴随着一个较发达的商品经济而共同发展。两者一直支配着中国封建经济达二千多年之久。因此,我们所谓“封建经济”,除西周时代经济尚有歧见外,无不以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形式和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为其基本内涵。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封建制度时,基本上均系以西欧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自然经济为前提,而支配中国封建经济的两个特点,只是在西欧封建制接近瓦解的晚期才开始出现。此时的欧洲恰好又是资本主义的发生和成长时期,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西欧这一历史时期的论述,多着重在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及

* 1982年夏天,《历史研究》和《晋阳学刊》在太原召开关于中国封建主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座谈会,这是作者提交的书面发言。

其对旧制度的摧毁,尤其对农民的残暴行为方面。而对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封建领主经济的状况甚少论述。所以,我们所说的中国封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论述的封建经济,无论在土地所有制方面或在商品经济方面,均有极大程度的不同。这就很难以经典作家对封建经济的论述为准则来分析中国的封建经济。近 30 年来,绝大多数学者都是引证经典著作中关于西欧封建经济的论述来作为分析中国封建经济准则,可谓方枘圆凿,两不相容。

由于这两个特点的存在,就出现了一系列难于解决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中国封建制下较长期而又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破坏封建制的作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从什么时期开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所扮演的角色与封建领主制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其对各种经济关系的影响有多大?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所以,研究中国封建问题首先应摆脱西欧封建经济的框框,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作出不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分析。

现在我们转谈社会基本矛盾在历史分析中的运用问题。这是一个尚未引起学者们注意的问题。中国封建经济支配的历史时期远较西欧封建制为长,是人所共知的。但是时间的长短还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西欧封建制从开始到全盛时期基本上处于所谓“黑暗时代”,亦即社会经济基本上处于静止状态,因而有关史料也不甚多。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论述《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一章中,只概略地分析了中世纪的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以前各形态》一书中,对中世纪部分仅指出了一些关于土地所有制与劳动的一般原则,对它们及其他封建经济的具体发展过程,未加分析。中国封建经济的情况与西欧不同,它不仅支配的时间很长,并在它的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政治的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许多方面均有极丰富的记录待我们整理,而且在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不论是农业、工业或商业,均各有其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显著差异。面对这一复杂的课题,自会产生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来加以整理分析的问题。

自 20 世纪 30 年代特别是解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般是运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具体地说,是用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这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来作为理论分析的武器。这无疑正确而必要的。但也会出现一些不能很好说明的问题。比如说,封建地租的剥削形式,它从秦汉起到清末这二千多年中,大体上是实物地租向货币地租的演变过程,而更多的时期为两者的交织采用。如果单纯从封建生产关系,或单纯用封建剥削关系来解释,那就会使我们对二千多年中的封建地租的分析,陷于千篇一律的状态,而无法说明为什么它不存在劳役地租形式,为什么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各甘于长期接受这两种形式及其作用不同的地租剥削形式,为什么货币地租的长期流行没有像在西欧封建制下那样起

着破坏作用,以及其他等等问题。

再举一个中国封建社会中极为突出的农民革命问题为例。在这一历史时期曾爆发过数百次的大小农民起义,一向的解释不外是农民在地主阶级地租的沉重剥削下走投无路不得不起而革命,也就是说封建生产关系已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照这样的分析,第一个无法解释的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问题。无论西周奴隶论者或西周封建论者,莫不肯定秦王朝的统一是中国封建地主所有制在全国范围内之开始确立,至于秦汉封建论者更不用提。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任何一种新的生产关系确立后,必然有一个有利于与它自己相适应的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究竟有多少长,经典作家未明确指出,也不必明确指出,因为它是随着各种不同生产关系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而大有差异的。但是它绝对不会短至十年、二十年,这是毫无疑问的。秦始皇自完全消灭六国之日起,建立他的全国统治为时不过十二年,且不谈在他死以前已出现过农民革命,他刚死就爆发了伟大的陈胜、吴广起义。许多历史学者对此次起义的分析大都归结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使农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不得不起而革命。为什么一个新兴的封建生产关系在确立后不但不曾对相应的社会生产力起着推进作用,反而在短短十二、三年时间就腐朽到迫使此社会生产力不得不起而反抗自己的程度?再说,如果这种分析是成立的,为什么中国封建生产关系会坚韧到二千多年间数百次农民革命尚未能达到使其瓦解的程度?东汉及魏晋封建论者们所面临的问题将更多。他们除了要面临类似于上述的问题而外,还得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即在一些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中,怎样确定前面的几次是奴隶们的最后摧毁奴隶制的暴动,而稍后的则是农民反封建的最早起义。总之,上面的这些问题均不是单纯根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就能解释的。其他问题还很多,不必一一列举。

我自己在50年代前期就曾一度被这个问题所困扰。后来在1957年从毛泽东同志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得到启发,才使我解脱困境,在中国封建经济问题的分析上展开了一个新的境界。现在不妨在这里把这一体会提出来供从事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的同志们参考。

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以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基本矛盾时,基本上均只提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毛泽东同志是第一次将这两对矛盾并列的提出来作为各社

会共同的基本矛盾。他虽然没有阐述为什么也要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提出来作为社会基本矛盾的原因。在今天看来,这样的表述至少对历史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十分重视,也是尽人皆知的。但毛泽东同志以前的经典作家在论述社会基本矛盾时,经常是只特别强调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从来没有把两者并列地作为社会基本矛盾提出来过,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处在争取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总是把论述的重点集中到各种新旧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时期的剖析,借以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能永存,这种生产关系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在任何一个新旧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时期,必然是现存生产关系已腐朽到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以这种腐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所组成的经济基础必然变成腐朽,从而建立在它上面的全部庞大上层建筑也必然腐朽,非变革不可。因此,在急剧变革时期,只提及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之尖锐就够了,相应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必须变革,就不言而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对此问题就是这样分析的。

但是,任何一种生产关系,也和任何一种事物一样,有它的发生、发展和衰亡的过程,并非经常处在一种急剧变革的时期。而在这种发生、发展和衰亡的各个阶段上对相应社会生产力所起的作用,积极的或消极的,促进的或阻碍的,会大有不同。另一方面,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也会表现出类似情况。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当一种生产关系还处在发生、发展阶段时,它不仅同相应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也同上层建筑基本上相适应。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或对生产力的影响,也可能由于推行了某种错误政策或统治者的横暴而造成一时的坏结果,而其总趋势仍是基本相适应的。相反的,当一种生产关系已处于衰落或濒临消亡的阶段时,它会同上层建筑一起对社会生产力日益起着阻碍、桎梏的作用,然而上层建筑也可能由于某种特殊情况暂时起一些和缓矛盾的作用,但仍不足以挽救两者的最后消亡。

根据上面的理解,首先,我们来分析历代的农民起义。大抵在唐代及以前的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是处于上升发展阶段,因而上层建筑也基本上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但由于个别统治者或其地方政府的横暴压迫亦可能激起农民的暴动,例如陈胜、吴广的起义即为最早的突出事例。两宋以后,封建生产关系开始其衰落过程,上层建筑也随着开始日渐僵化,故农民的反抗运动也更为频繁,但在个别时期也可能由于个别统治者的警惕,出现暂时的安定局面。特别是考察一下激起历代农民革命的原因也能证明上述的论断。在唐代及

以前的农民起义,基本上均系由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所激起。两宋以后特别是明清的农民起义,有不少是为了反抗沉重的地租剥削,这是唐以前所罕有的,也正好说明了封建生产关系是真正的腐朽到使首要社会生产力——农民难于生存的程度。明确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激起历代农民革命的还有其他的直接原因,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来说,这才是最本质的东西。仅就这一点而言,即足以表明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并列为社会基本矛盾,不仅在理论上正确,并能得到历史事实的证明,特别是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历史分析是一个很有力的指导理论。它比单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为指导的分析要减少好多困难,避免好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缺点。

除农民革命而外,其他封建经济问题能够以此理论来解释者甚多。这里,再简单地提两三个例子。例如,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在汉魏时期多是来自一些所谓“豪强”、“世族”一类的地主,他们的压迫主要是靠他们依托于封建官府的政治特权。到北宋时虽然仍存在“品官形势”之家,而一般未具有封建特权的中小地主的剥削已较为普遍。如苏洵在其《田制》一文所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明清时期如 17 世纪中叶顾炎武在其《菰中随笔》中描述的吴中田农的苦痛,17 世纪末期黄中坚在其《蓄斋集》中所反映的中小地主的怨声,乃至 19 世纪后期陶煦在其《租核》中代佃农向中小地主的重租提出的呼声等等,如不加区别的把秦汉到明清的这类情况,均视为生产关系已经腐朽的反映,或视为铁板一块的地主阶级对同样农民的剥削,不仅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又如工商业的发展,使宋以后出现了多次由于商贩或小手工业者组织的起义,也是以前所少有的。再就最能反映工商业发展水平的行业分工而言,我国在第 8 世纪的长安已分为二百二十行,到 14 世纪已有三百六十行。有人说在 12 世纪时已有包括服务行业在内的行会达四百十四行之多。即使除去服务行业仍有二百多行,何况服务行业之多,也同样可以反映城市经济的繁荣。而欧洲在 14 世纪时,行会最多的巴黎也不过三百五十行,其他大城市不过百行左右,这已构成欧洲资本主义开始产生的条件。为什么我们研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同志还小心谨慎地不敢将它推早到明代以前?所谓“萌芽”不等于就是开始产生,只要有两三处断续出现的作坊式协作生产也是萌芽。难道汉唐以来的中国连这种事例都不曾有?这恐怕是硬要比拟欧洲的情况而立论,忽视了我国工商业之发展是随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而存在的特点的缘故,也忽视了上层建筑在不同时期对工商业所起的反作用的缘故。所以,研究中国封建经济必须首先摆脱西欧典型封建模式的框框,另起炉灶。同时,还须充分运用毛泽东同志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为分析的武器。

以上的分析,只是为了提供一些探究中国封建经济问题的线索,不一定都正确。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历史分析中的运用,并不足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再以农民革命为例,从秦汉到唐或从两宋到清末各有一千年左右时间,又各有数以百计的农民起义,不可能一一运用这两对基本矛盾的理论加以说明。但是,运用它作为理论分析的武器,却可避免绝大部分由于只依据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以进行分析时所产生的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断。

载《财经研究》,1982 年第 5 期

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 主要方面及其意义

巫宝三

治中国经济思想史者常要回答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有什么意义？问题提的更尖锐一些，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是否有作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说？这个问题，好像已经成为过去，它已经由好几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的出版作了回答。但是这个问题仍然像是一个幽灵在经济学界游荡，虽然它确实得到了一些解答，因而消除了一些迷雾，然而它似乎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说明和论证，使上述问题焕然冰释，不复存在。我认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者的任务，就是继续前人披荆斩棘作出很多研究成果的努力，深入探索，揭示客观史实，剖析其中意义，使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建立在对象明确，内容丰富，意义肯定的基础上，从而为弘扬中国固有文化和丰富世界经济思想作出应有的贡献。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几代人的努力。本文之作，仅希望在这方面能尽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凡是根本问题，都非一言所能定案，而必须反复琢磨，从不同角度进行考察和论证，使能逐渐得到“众说金同”、难以驳倒的结论。从这点出发，我准备在下面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研究，另一个是，如何评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思想。讨论这两个问题，显然对于回答上述根本问题是必要的，而第二个问题更是问题的关键，需要作为讨论的重点。先谈第一个问题。

提出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问题，是十分自然的。一因中国自古代以至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从未有过中国经济思想史这种著作。陈焕章

的《孔子及儒家的经济学说》一书是专题研究,也是在 1911 年才出版的,并且是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出版的^①,知道的人甚少。二因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专门研究,如果从 1926 年出版的甘乃光的《先秦经济思想史》一本简史算起,到现在也只有半个多世纪,较在 1837 年出版的欧洲最早一部经济学说史(布朗基:《欧洲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史》^②)要晚近百年,并且在这个时期中也只从 80 年代以来这项研究才有较大发展。这些事实,表现出来学术界对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存在着不同看法。但是,这里既然提出以西方经济学说史来作比较,那么如果问为什么欧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著作没有更早出现,而迟至 1837 年才有第一部著作问世,道理岂不是相同吗?因此,为解答上面所提出的问题,回顾一下欧洲经济学说史这门学科的发展历程是有启发意义的。

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和各门科学史一样,它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这门科学发展若干年代以后,表明它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内,通过不断积累知识和研究,得出这一领域事物的内在规律,它既是理论性的,又是可以观察和验证的。经济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开始的,是在商品生产和交换发达以后产生的,在时代上,是在 15 世纪末至 16、17 世纪,那时出现了代表商业资本利益和重视对外贸易政策论点的重商主义学说。用马克思的话说,重商主义是“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③在这以前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制社会,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经济关系比较单纯,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是哲学和政治论述的延伸,极少把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进行研究。这在中国古代也是如此。上述在欧洲最早出现的布朗基的欧洲经济学说史的研究著作,距离最早重商主义著作的出现已有二百多年。可知欧洲经济学说史这种专门著作的出现,是在继重商主义许多著述以后,先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英国法国有古典经济学的产生,随后有标志着经济科学发展新阶段的法国重农学派魁奈经济学说的产生,有英国亚当·斯密创立了的经济理论体系,有进一步发展了经济学理论的英国李嘉图、法国西斯蒙第的经济学说。由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越来越发展,客观上有必要来研究它发展的来龙去脉,它的重点虽然是在近代,但近代思想概念的产生,有它过去的渊源关系,这样也就有必要研究经济思想自古到今的发展历史。随着欧美各国经济的激烈变动和发展,也出现了经济学说群说并起的空前兴盛局面,这就使得经济学说史作为一个分支学科的地位确立起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如工业经济、劳工经济、农业经济、货币银行学等尚未确立,在法国,经济学说史成为大学主修和学位考试的主试科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情形虽有改变,但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的地位仍然确立不

移,几乎每年都有几种经济思想史的新著出版。由此可以看到这门学科在经济科学中的地位了。

就中国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的迟缓,经济思想一直没有突破封建主义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框架。迟至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以前,尚未出现论述近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理论著作。在19世纪中叶以后至20世纪初期,在经济学说上是以介绍西方经济学说为主,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课题还提不上日程。直到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学说和实践,更唤起了知识界的觉醒,思所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振兴中华,乃有学者开始我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经济思想之准备”^④。以此来看5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发展,大致亦是缘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奋起和经济研究的蓬勃发展,学者们思发掘我国悠久而丰富的古代文化中的经济思想,为创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资料,亦所以为丰富古代世界经济思想做出贡献。这种设想,已经不仅是我国经济学者所具有,外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多发出这种呼声了。举例如苏联汉学家史太因在其著作《〈管子〉,一个研究与俄译》一书中说,“在经济思想史的课程和教学中,对中国(及其他东方国家)至今几乎未赋予任何地位。……几乎局限于考察欧洲大陆范围内经济思想意义的形成。……对早期世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早就应加以改造,把东方也列入它的研究课题”^⑤。这就是说,现在的一般经济思想史著作,只是欧洲和北美洲的经济思想发展史,而不是包括各个有悠久文化地区的全世界范围的世界经济思想史。又如印度公元前一部经典著作《政事论》,其中记载古代印度的经济思想,此书编者名考塔里亚,在印度现在已有《考塔里亚的经济学》的研究著作出版(1967年)。最近印度出版一本《经济思想史》,其中有《印度经济思想》一章^⑥,对于印度从古代直到近代的经济思想,作了一个概括的论述。这说明了现在研究经济思想史在扩大范围方面已在迈步前进。关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的研究,西方有识之士亦多寄予浓厚兴趣。如著名现代经济学家熊彼特即说,“在古代中国比在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可以指望发现许多方面的古代经济思想,中国是我们所知道的保存有最古老典籍文化的所在地。事实上,在那里我们看到一种高度发达的公共行政制度,日常处理农业、商业和财政问题。……更有进者,那里有货币管理和兑换控制方法,决定这些方法似乎必须先经过一定次数的分析。”^⑦西方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是深信不疑的。然而由于不能直接阅读中文史料和中文著作,以及由于用西方文字出版的中国经济思想研究著作极少,过去仅有两种,一为上面所举陈焕章所著之书,分量虽大,但过多生搬硬套近代经济概念,缺乏科学分析,一为李肇义所著书,为法语本^⑧,甚简略,知者不多,因而对古代

中国经济思想了解甚少。最近胡寄窗教授的《中国经济思想史简编》的英文本^⑨已经出版了,从此可以弥补过去的不足,西方学者可以较多地了解中国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发展概况。但过去西方学者有认为古代中国经济思想虽然丰富,但多为经济政策意见和主张,缺乏科学分析内容。如泰勒即说:“没有一个东方国家有任何东西可以与西方国家中世纪僧侣们所作出的良好开端的经济分析相比拟。”^⑩要否定这种论断,不是用几句对抗性语言所能济事,而必须用实实在在的思想资料,经过缜密研究作出论证和说明。这个工作,可以说是本文所企图达到的目标之一,在本文下节也要扼要进行论述。总起来说,中国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是中外瞩目的一项研究,它有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这样有利的研究条件,它是世界经济思想通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它虽然起步较晚,那是为历史条件所决定的,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科学研究的开拓,它必将愈来愈在广度和深度上展开它的研究和显示它的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就来讨论中国经济思想(以先秦为例)的内容及其意义问题。

二

各个时代和各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于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一个大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常常包涵这三个方面的经济思想,最明显的例子是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说,它既有以道德哲学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哲学思想,又有对于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成因和各种关系的理论分析,还有由此而得出的经济自由主义各种经济政策处方。但不是所有各个经济学家都是如此明白地呈现出来这三方面的经济思想。作为另一极端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数理经济学家所作的经济分析,他们既不说明他们的经济分析所源出的基本思想,也不提出他们根据经济分析所作出的政策意见,而仅仅是对经济现象和问题本身内在和外在关系的分析和说明。但即以这种极端例子而言,也不难从它所根据的前提及各种关系的机制,发现这种分析所依据的基本思想以及隐含的政策性结论。一般来说,一个思想家的经济思想,着重表述了上述经济思想的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而未论及其他两个方面或一个方面,在经济思想史中并不乏见,在近代如此,在古代更为显著。但这种情况,如上所述,并不妨碍我们去探寻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我们所要论述的是,这三个方面的经济思想都有其重要意义,而在古代的经济思想往往以哲理和政策观点的经济思想居多、经济分析较少的情形下,则我们除了要着重说明经济哲理和政策性

思想的意义而外,还要努力探索思想家在政策性论述中连带所作的经济分析,并阐明其重要意义。以下我们试就先秦经济思想这三个方面的情况及其重要意义作一些扼要的说明,或者有助于对经济思想作进一步的探讨。先述作为经济思想出发点的基本思想或哲学思想。

古代学科没有分立。思想家总是从宇宙本源,社会制度,即所谓天道和天道,以及天人关系等方面开始探索。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从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开始论述,并且总是综合论述这些问题。以此为基础,而再论及其他问题,经济问题是常被连带论及或当作个别具体问题论述之一。古代中外大思想家,很难说他首先是一个经济思想家,而总是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或教育家,或政治家,但在他的学说思想里包涵有丰富的和卓越的经济思想。古希腊的柏拉图是以哲学家而著称的,他不是研究经济问题的人,但在他的著名著作《理想国》中,却有关于分工问题的卓越论述。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知识广博的思想家,他的著名的货币学说,却是在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著作中作为一个具体问题论述的。我们下面就要展示,古代中国经济思想也完全是在与此相同的模式中出现。这里需要着重说明,古代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与经济思想的关系的上述模式,固然是受古代科学发展条件所制约,但经济思想与哲学、政治思想的关系,有其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某种经济制度的存在以及某种经济问题的出现,必然要求思想家从政治上、从道德规范上和从不同阶级利益上予以解说,以至要求在天人关系上等方面寻求哲理的说明。另一方面,关于国家和政治制度的思想,关于善和恶、正义和非正义的道德标准的思想,以及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各派思想家对于当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问题所表示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从而形成了当时的经济思想。这二者间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关系,不但存在于古代世界的学说思想,在近代以至当前的学说思想中,亦何尝不存在?古代世界经济思想之附属于哲学、政治、伦理等思想的情形,初看起来似乎是颇为独特的,不过若细究二者间的本质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自古至今都存在的,不过在古代经济学说思想还没有成长起来成为独立学科,愈显出其附属性而已。所以在研究古代世界经济思想时,同时研究它所源出的哲学、政治、伦理等基本思想,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必要性,由于某一学说思想成为一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并且这种传统文化对现代经济发展的作用成为一个有待研究的重要问题,就显得更为特出了。下面以儒、道二家学说思想为例以说明之。

儒家的学说思想,在我国封建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约达两千年,从其创始人孔子而下所有著名思想家,都是以哲学家、政治思想家、伦理思想家等等而闻名的,包括孔子在内可以说没有一人是以专攻经济问题而著称的。但是这不等于说他

们没有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法国近代著名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创始人魁奈,即对中国儒家的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推崇备至,以至他自己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由此不难想见,孔子以及儒家的经济思想不是由于他们不是著名的经济学家而无足称道,相反,倒是应该根据孔子等所处的时代,着重研究孔子等是根据什么哲学、政治思想,而对经济问题做出论述的,以及这种哲学、政治思想对于论述经济问题的独特意义。最近一二十年来,由于东亚几个地区,如南朝鲜、新加坡、香港,及我国的台湾省,经济发展速度相当快,而这些地区在文化上儒家学说思想都占重要地位,这种情形就提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其中主要是儒家学说思想,与经济发展究竟存在何种关系,是消极的关系还是积极的关系?如果是积极的关系,其主要作用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个问题初看起来似乎完全是哲学、政治和伦理思想方面的问题,但是传统文化不可能不包涵人们的经济活动及其主导思想,而这些思想正包涵在儒家哲学以及政治伦理思想之中。所以要研究这些地区儒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正是要研究儒家的哪些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发展能起积极作用,而这些经济思想是以什么哲学、政治、伦理思想为基础的。

总的来说,孔子的哲学、政治、伦理思想表现在他的尊“礼”和重“仁”的学说上。“礼”是当时宗法封建等级制度的概括,孔子一再赞美周礼和谴责僭越礼制,是为了维持宗法封建伦常等级制度,他并提出“义”的概念,凡是合乎各种宗法封建伦常制度的行为,就是合乎道德准则的,就是“义”,否则,就是“不义”。“仁”是尊“礼”取“义”的道德规范体系如孝悌、忠恕、信义等的核心,泛言之,要“爱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主张推己及人。孔子这一整套哲学、政治、伦理思想,不能不表现在对一些重大经济问题的论述上。孔子说治国安民要“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这五种品德都是仁,“宽”、“惠”是对经济问题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孔子说了很多“重民”(“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利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足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语·颜渊》)、“养民”(“其养民也惠”(《论语·公冶长》)、以及“济众”(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等的话,都是“惠民”、“宽众”经济思想的发挥。这些思想表现在孔子所主张的经济政策上,有弛禁思想、薄赋敛思想等。孔子仁的思想,以后由孟子在政治思想上发展为民贵君轻的仁政学说,在伦理道德上发展为仁义学说,内容更为丰富和系统化,它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之学中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显学”。到了汉代“独尊儒术”以后,终我国封建社会,它不但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崇,在整个文化教育思想中它也居于统治地位。仁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存在的意义,是因为它既有适应于各特殊时代要求的个性,如维护宗法封建社会